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骥

话说2024年,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来自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南仓村西侧空地上的土层,向下清理20厘米,地表清理面积1500平方米,一座元代的建筑基座展示在面前。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清十四仓遗址,而这次考古工作也是全国首次科学发掘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

历时两年发掘,武清十四仓的两座仓房基址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发掘出的文物也揭示了曾有元代大型官署建筑伫立于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沽上仓影——十四仓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天津市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开展,关于武清十四仓遗址的现阶段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尽数亮相。但参与现场考古的工作人员坦言,对于武清十四仓的了解与发掘还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2周年,我们一起走近当年的天津段大运河“北大门”。

观展十四仓:63件文物揭示现阶段考古成果

作为考古成果展,展览从《元史》中的资料开始,随后便是天津市考古工作者接力棒式的寻找、调查、勘探、发掘,让深埋地下的武清十四仓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展览展出了63件(套)文物与大量考古遗迹实景,同时还有各个时间段的考古报告。策展人王志习认为,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观众如同跟随考古工作者一同探索,一步步揭开历史的面纱。

武清十四仓的建造,源于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他清楚地认识到元大都距离富庶的江南较远,而元大都的百姓、官兵以及众多职能部门 的供给又要倚仗江南物资。为了维护统治,他命人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裁弯取直,不再让运河绕行河南洛阳,而是从北京直通杭州,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走向。京杭大运河修通后,江南地区的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元大都,维持首都运转。

漕船一刻不停地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其中江南地区种植的优质粮是元大都最需要的物资之一。不过,元代的京杭大运河与我们熟知的京杭大运河略有不同,受限于通航条件、水利设施、维护水平等因素,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效率不高,运转远没有明清时期流畅。对于漕粮这类重要物资,元朝政府还要依靠海运将漕粮运至天津,再转运至元大都。但是天津至通州的漕运水渠走向迂回且行程较远,于是元世祖又命人将这段水渠裁弯取直,水渠改道蒙村至杨村,至此天津市西北方向的河西务就成了漕运咽喉之地。

“鉴于河西务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元大都的需求,武清十四仓就在这个时候陆续建造。”王志习介绍,北运河流经河西务的这段河道狭窄,大型漕船无法通过,船工会将货物放到小型漕船上,也让河西务自然而然变成了货物中转站,修建粮仓再合适不过。而且,武清十四仓所在的位置距离北运河故道最近处只有不到两公里,装卸货物十分方便。

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元史·百官志》中详细罗列了武清十四仓的名称,但是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勘探结果还有走访调查,王志习认为当时河西务不仅存在十四座粮仓,应该是根据需要,粮仓的数量逐渐变多。《元史·百官志》中记载,为了统管当时河西务以及周边地区的漕运事务,元朝政务设立都漕运使司,官阶正三品,其办公地就在武清十四仓。

残破的鸱吻、武士、螭伽、陶凤鸟,以及相对完整的筒瓦等建筑构件相继在武清十四仓考古现场出土,证明了当时武清十四仓中不仅存在粮仓,而且还有元代的大型官署建筑,都漕运使司的办公地点就设立在这里。王志习介绍,鸱吻、螭伽、凤鸟等均为官式建筑的脊饰,虽然残破但是造型精美,是断定建筑等级和年代的关键证据。此外出土的兽面纹瓦当、重唇板瓦等构件的风格与元上都遗址、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接近。“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元代龙泉窑的瓷器,这些瓷器釉色莹润,展示了元代的工艺与审美水平,据推测应为当时武清十四仓内的官员、漕工的生活用品。”

考古十四仓:六十年接力展露粮仓真面貌

武清十四仓,凝结了天津市几代考古人的愿望与付出。

20世纪60至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十四仓遗址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和一次试掘,采集到铜镜、石砚、铁权、铜权、景德镇窑青白釉带座狮子、磁州窑红绿彩人形瓷塑等大量文物,并初步确定东西仓村、裴庄一带为遗址所在。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些工作多为分散探索,未能厘清遗址的完整范围与地下保存状况。

进入2019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专项调查与勘探,调查面积约1.14平方公里,初步探明十四仓遗址的大致分布。2022至2023年,进一步发现以蔡庄村、东西仓村、南仓村为核心的3处遗迹集中区,以及运河故道、引河、人工水体、道路等关联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南仓村附近发现一处格局保存较为完整的漕仓院落。

2024至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南仓村南的漕仓院落开展连续两年主动性考古发掘,标志着十四仓考古进入系统化实施的新阶段。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助理馆员杨艺洁介绍:“两年的发掘,让一座规模宏大的元代漕仓院落逐渐显露真容。该院落由12座形制基本一致的大型建筑基址组成,呈对称分布:中央东西并列2座,外侧10座合围;东、南、西三面环沟环绕。2024年完整揭露的F1仓廩,面阔十间、进深三间,前设廊厦,与《经世大典》‘每十间用物’的记载完全吻合,填补了元代国家漕仓形制研究的空白。”

2024年发掘的F1仓廩,其平面上方仅发现少量清代墓葬,保存相对完整。而到了2025年,在同一院落西南区域的F4附近,考古人员揭露

出了38座清代墓葬,其中包括一整片家族墓地。杨艺洁说:“密密麻麻的墓穴打破了仓廩的原有平面,证明了最迟在清代,这座元代国家粮仓的地上建筑已完全消失,沦为坟冢。但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剖面。”

在粮仓“地基”坡面中,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墙基时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墙基和碌墩的填土中,混杂着大量唐代、宋代的瓷片和砖瓦。这些“外来”的碎料并非原生地层,而是营建仓廩时有意从别处搬运来的“回填料”。杨艺洁说:“这也向我们引发新的猜想——如此大体量的废旧建筑材料,究竟来自哪座更早的建筑?是就地取材,还是另有来源?或许在后续发掘中可以找到。”

在展厅的最后部分,许多现代考古手段映入眼帘。杨艺洁介绍,面对如此复杂的遗存,仅靠传统方式已远远不够。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碳十四测年、古建筑复原等多学科考古已经成为现代考古的趋势。

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石杵。它出土于仓廩建筑基址附近,最初专家对其用途存在分歧:一方认为是建造仓廩时夯筑墙基的工具,另一方则判断为日常研磨粮食或药材的生活用具。植物考古给出了答案——研究人员从石杵表面提取到水稻特有的扇形植硅体和双峰型植硅体。这也明确表明,石杵曾用于研磨稻谷,它并非建筑工具,而是仓廩管理人员或驻军的生活器物。

另一件关键文物是一只明代青花花卉杂宝纹碗。它出土于一处打破漕仓院落的灰坑(H7)中。地层关系显示,碗的埋入晚于仓廩的废弃。经陶瓷考古专家鉴定,该碗的年代恰逢属于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十四仓“空白期”产品(约1436—1464年)。与记载的“明景泰年间,河西务十四仓已全部移往通州,原有仓址废弃不用”相吻合。据考古人员猜测,这只碗并非仓廩使用者的遗物,而是仓廩废弃后,后人留下的生活痕迹。

认识十四仓:粮仓、钞关、遗址

辉煌 的十四仓也逃不过历史的变迁。王志习介绍,在明清时期,河西务十四仓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仓储重地”转变为“关卡枢纽”与“历史遗迹”,其兴盛与消亡深刻反映了漕运制度的变迁。

明永乐二年(1404年),河西务曾建仓囤160间,并设立武清卫仓。但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和罢海运、专行河运,以及“支运法”推行,通州仓地位上升。明正统年间,河西务仓被拆毁三分之一;至景泰初年(1450年—1456年),“移武清卫诸仓于通州”,“十四仓”的核心仓储职能基本终结。到了明中后期,河西务变成了运河上的钞关与商业中心。由于地处“漕渠之咽喉”,河西务成为南北商船进京的必经关卡。明朝在此设立户部分司(河西务钞关),其税收功能远超仓储,成为全国七大钞关之一,有“京东第一镇”之誉。

清朝时期,随着漕运全面北移通州,河西务的漕运地位急剧衰落。清乾隆年间编修的《武清县志》已将“河西务十四仓”明确列入“古迹”条目。而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更直接记载:“等谨按河西务十四仓今废。”至此,十四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埋藏地下的遗址。

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立都漕运使司,到明景泰初年武清十四仓仓储功能终结,武清十四仓伫立在运河畔不到200年,其与后续明清两朝京漕漕运一同构成了完整的国家漕运仓储网络,也对京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史·百官志》中,武清十四仓与通州十三仓、直沽广通仓等,一同归河西务的都漕运使司统一管理,这些位置不同的仓库群形成了元代国家漕运体系中功能互补、层级分明的一体化网络。其中,武清十四仓是海运与河运转运的前端和中转枢纽,负责接收、存储来自南方的巨量漕粮。通州十三仓则是进入大都之前的中途储备与接运节点。“功能上也相互衔接,武清十四仓是‘国家粮库’,通州仓是‘城郊转运库’,而北京城内的南新仓、北新仓等属于‘京师粮仓’。”

对于北京而言,武清十四仓对于元朝在北京建都具有战略性的根本保障意义,堪称元大都的“生命线”。《元史》记载,武清十四仓具有“供亿京师、赈恤黎元”的战略功能,是元大都外围最重要的国家粮食储备基地之一,直接服务于元大都的百万军民供给。同时,元朝为管理这一庞大的仓储系统,在河西务设立了正三品部门“都漕运使司”,此高规格的派驻机构直接体现了十四仓承载的“国家使命”。它负责接收海运漕粮,并统筹管理河西务十四仓、通州十三仓、馆陶等十七仓、直沽广通仓等沿线粮仓。王志习说:“没有武清十四仓的庞大仓储和中转,南粮就无法稳定、及时地供应到‘去江南极远’的大都。元代诗人傅若金的诗句‘燕前舟车会,江南贡赋多’,生动描绘了江南赋税通过河西务汇聚大都市的景象。武清十四仓是元朝奠定大都首都地位、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经济基石。”

“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武清十四仓遗址证明了在明代设立“天津卫”之前,元代的直沽(今天津)已因漕运和仓储成为重要的经济枢纽。它为天津作为“运河载来的城市”这一宏观叙事提供了最核心的考古支撑,是解读城市形成逻辑的关键钥匙。而武清区的河西务镇是天津段大运河的“北大门”。十四仓遗址是这一地区因运河而兴最直接的明证,其考古发现从根本上定义了武清“漕运文化重镇”的历史地位,是当地最厚重的历史文化名片。